

· 经济管理 ·

中老年消费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 来自 CHARLS 的经验证据

宋 泽¹, 何 阳²

(1.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2. 北京大学 现代农学院, 北京 100871) *

摘 要: 利用 CHARLS 数据考量中老年人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结果发现: 2011—2015 年中老年家庭总消费水平快速上升, 同时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从消费分类上看, 医疗保健对中老年人消费水平影响最大; 从年龄效应上看, 中老年群体不平等在 67 岁以后开始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后出生中老年群体会积累更多财富, 在基本衣食需求满足后, 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效应更多体现在家庭用品、教育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

关键词: 消费不平等; 中老年; 度量; 分解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217(2019)03-0107-06

DOI: 10.16339/j.cnki.hdxbcjb.2019.03.016

一、引 言

从 1999—2017 年中国在 18 年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净增 1.1 亿, 预计到 2050 年将达 4.87 亿, 占总人口的 34.9% 标注文献来源(老龄办, 2018)。人口老年化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长期挑战。数据显示: 2014—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 4 万亿左右增长到 106 万亿左右, 占 GDP 的比例将从 8% 左右增长到 33% 左右, 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 了解老年人消费变化趋势, 洞悉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风险, 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潜力, 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要点, 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关键。

群体不平衡是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之一, 其中消费不平等是群体不平衡中重要的问题。消费是最终需求, 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 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消费决定了个体实际效用水平, 并且在同一时点上比收入分布越窄, 趋势变化也越平滑^[1]。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演变趋势和影响原因。国外研究发现, 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消费不平等长期上升的趋势^[2-4]。对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变化, Cai 等(2010)发现中国城镇居民 1992—2003 年消费不平等稳步上升, 上升原因是国企改革、城市化和全球化

的结构改革^[5]。杨继东(2013)分析了不同消费分类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发现教育、娱乐和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不平等程度上涨幅度更大, 而家庭设备用品和医疗保健消费不平等则呈下降趋势^[6]。赵达等(2017)修正了调查数据中的测量误差, 重估了 1993—2010 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演变趋势, 发现消费不平等程度比原始数据高 36%, 消费不平等的上涨趋势在 2008 年以后有所缓解^[7]。

消费不平等可分解为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8]。Ohtake 和 Saito(1998)发现日本居民消费不平等从 40 岁开始上升, 人口老年化是造成消费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9]。但曲兆鹏和赵忠(2008)发现,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主要源于出生组内不平等, 老年化对不平等影响很小^[10]。余玲铮(2015)则认为造成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年化^[11]。邹红等(2013)利用 CHNS 数据构建存量耐用品价值模型, 分析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发现, 收入不平等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相比之前群体,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群体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更低, 而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12]。孙豪等(2017)使用城乡消费分组数据, 通过估计消费分布参数测算消费基尼系数发现, 中国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消费不平等, 其次为城乡各自内部的消费不平等^[13]。

我国是全球人口老年化风险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宏观上看, 人口老年化深刻影响经济资源配

* 收稿日期: 2018-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18VSI070)

作者简介: 宋 泽(1985—), 男, 云南个旧人, 经济学博士,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保险和居民消费。

置,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潜力;从微观上看,老年是生命周期中负面风险最容易聚集的时期^[14]。因此,研究老年消费变化趋势和不平等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以往文献来看,人口老年化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一致的结论。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往研究分解不平等都是以20—25岁青年群体为参照,没有考虑老年群体在消费需求和偏好的差异。因此,本文利用最新的全国代表性中老年微观数据测度消费不平等具有理论和实证的必要。本文利用CHARLS系列数据分别从整体、城市和农村层面分析中老年群体消费的变化趋势,并以初老期45—50岁组群为参照对消费不平等进行分解,从而为应对老年化风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与特征描述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退休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CHARLS是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CHARLS调查迄今已经完成了三轮全国调查,分别为2011、2013和2015年。首先对CHARLS中的消费数据进行整理。CHARLS是用一次性回顾的方式对消费进行测量。消费类型主要分为食品支出和非食品支出两大类。我们整理得到衣着消费等17项非食品支出的年支出金额,其中不包括汽车、电器等耐用品和纳税支出,并根据家户人数规模计算得到各项非食品的家庭年人均支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费分类标准,把十八类消费整合为八大类:第一类为食品;第二类为衣着;第三类为居住,包括水电费、取暖费、燃料费和物业费;第四类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后简称:家庭用品),包括保姆费和日用品;第五类为医疗保健,包括医疗费和保健费;第六类为交通通讯,包括交通费、邮电和通信支出、各种交通通信工具的购买维修及配件费用;第七类为教育文化娱乐(后简称:教育娱乐),包括教育和培训支出、文化娱乐支出,以及家庭的旅游支出;第八类为其它商品和服务,包括社会捐赠支出和美容支出。最后把八大类消费加总得到家庭总消费。

用主受访者的年龄代表家庭的年龄,并用家庭总消费和各类家庭分布消费除以家庭人数得到人均家庭消费信息,并根据CPI指数调整到2015年价格水平。由于样本过少不利于分组,且年龄超过了90岁,剔除了1920年以前出生样本22个。在剔除了八大类消费支出小于0的样本后,共得到29,428个家庭样本,其中2011年样本9,655个,2013年样本9,752个和2015年样本10,021个。

从调查数据来看,2011年主受访者年龄均值为59.92岁,2013年年龄均值为60.85岁,2015年年龄均值为61.78岁。整体来看,受访家庭的平均年龄在进一步上升,中国老年化状况日趋严重。从性别来看,2011年主受访者女性的比例为0.53,2013年为0.54,2015年为0.54。性别构成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1 消费水平和消费不平等

	年份	样本数	总消费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教育娱乐	其他
均值	2011	9644	8300	3985	407	753	207	1358	729	828	45
	2013	9747	10651	5496	409	896	416	1766	860	797	41
	2015	10015	11926	6025	500	1063	435	1949	1110	915	43
对数方差	2011	9644	0.975	2.430	5.467	2.194	2.708	5.889	3.882	11.005	3.552
	2013	9747	1.213	1.875	5.695	2.037	4.852	6.963	3.377	11.246	3.505
	2015	10015	1.433	2.399	6.110	2.260	6.302	9.148	3.592	11.163	3.142
比重/%	2011	9644	100	49.23	5.43	11.17	2.81	15.07	9.31	6.72	0.35
	2013	9747	100	52.44	4.17	10.79	3.60	13.72	9.00	5.96	0.30
	2015	10015	100	51.02	4.48	11.86	3.54	13.52	10.20	5.12	0.26

表1描述了消费水平和消费不等的变化情况。本文使用经过无应答调整后的家庭权重计算均值、对数方差和消费分类比重。结果显示,家庭总消费从2011年的8300元增长到2015年的11926元,年均增长率为9.4%。从消费分类来看,主要消费类型都呈上涨趋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家庭用品,年均增长率为20.4%;其次为食品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0.8%。从不平等程度来看,消费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对数方差从2011年0.975上升到1.433。不平等

程度最高的消费分类为教育娱乐。本研究的总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邹红等(2013)^[12]和余玲铮(2015)^[11],主要原因是本文使用的样本为中老年样本,同时邹红等(2013)^[12]为耐用品消费存量消费,余玲铮(2015)为城市家庭样本^[11]。教育娱乐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只有满足基本衣食住行以后才会进行相应消费。其次为医疗保健,中老年群体健康状况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医疗需要各不相同。从消费比重上看,食品消费的比重在50%左右,成为影响中老年群

体消费不平等的最关键因素。虽然医疗保健的比重从2011年的15.07%下降到13.52%,但医疗保健仍是影响中老年消费不平等重要消费类型。原因主要是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长,因个体差异造成的医疗费用支出不同。此外,在2011—2013年,医疗保健比例下降了1.35%,这可能得益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降低了家庭的自付医疗支出。

借鉴Deaton(1997)^[15]的研究,本文选择5年作为队列间距构造年龄—队列面板数据,共生成10个年龄组队列,样本最早的出生年份为1920年,最晚的为1970年,考虑到划分队列的对称性,把1965—1970年划入归为同一个组。因此,最早的队列为1920/1924年组,最晚的队列为1965/1970年组。附表1给出了队列样本分布情况。

三、模型设定

消费变动可以分解为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根据Deaton(1997)^[15]的研究,假定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不存在相关性,设定模型为:

$$y_{at} = \beta + \alpha_a + \gamma_c + \Psi_t + u_{at} \quad (1)$$

其中 y_{at} 为每一家庭在调查年份 t 的总消费和分类消费; a 为年龄;由于CHARLS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为3期,本文设 c 为出生年份队列; t 为调查年份; α_a 、 γ_c 和 Ψ_t 为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其中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影响消费的增长,时期效应反映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消费的影响。

根据Ohtake和Saito(1998)^[9]的研究,消费不平等(对数方差)可以分解为出生组效应和年龄效应,设定模型为:

$$\text{Varln}C(j+k) = \sum_{m=j_0}^j \alpha_m \text{cohort}_m + \sum_{n=k_0}^k \beta_n \text{age}_n \quad (2)$$

其中, $\text{Varln}C(j+k)$ 为出生队列 j 和年龄组 k 的消费对数方差, cohort_m 为出生队列的虚拟变量, age_n 为年龄虚拟变量, α_m 为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效应, β_n 为年龄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消费水平分解

1. 年龄效应。图1显示不同出生年代的年龄消费曲线。从中可以看出,中老年群体总消费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这符合生命周期假说。所有队列的消费水平都随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同一

年龄中,年轻的队列比年老的消费水平更高。这一结果和余玲铮(2015)^[11]一致,表明经济快速发展福利更多惠及年轻群体。例如在60岁,1955/1959年组群的消费水平是1950/1954年组群的1.27倍。从城乡地区上看,城市家庭的各队列的消费水平都高于农村(图2)。相比城市,农村家庭同一队列中消费曲线的波动较小,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更弱,且消费观念更趋保守,造成消费曲线更为平滑。此外,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从中年到老年进一步拉大,主要原因是农村养老待遇水平相对较低,导致消费能力远低于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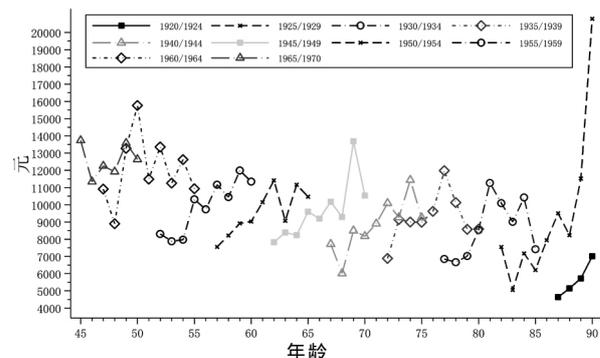


图1 年龄—消费曲线

消费需求结构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生不同的变化。附图1呈现八大类消费的年龄效应(受制于篇幅,附图省略,后文同)。除了医疗保健外,其余七类消费类型都随年龄上升逐渐下降,其中食品和居住下降更为平缓,食品在75岁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衣着、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从45岁开始持续下降,原因在于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长对衣着、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的需求持续下降。城乡居民年龄消费曲线的变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教育娱乐下降趋势与其他消费类型不同,从45岁快速下降至55岁,这是由于子女教育支出随着教育基本完成而快速减少。此后,随着年龄进一步增长,在65之后娱乐需求进一步下降,并且下降主要发生在农村居民,原因在于城市居民在退休后有更多闲暇时间,在更高的养老金待遇的保障下,会进行更多的娱乐消费。

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14~65岁人群的3倍,医疗保健成为中老年群体最为重要的消费。我们发现从45岁起医疗保健曲线持续上升,在80岁时达到顶点,此后呈现断崖式下降。《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超过预期寿命群体的健康水平更好,对医疗费用的支出需求相对较低。得益于更

好的支出能力和医疗条件,城市家庭医疗保健的年龄支出水平高于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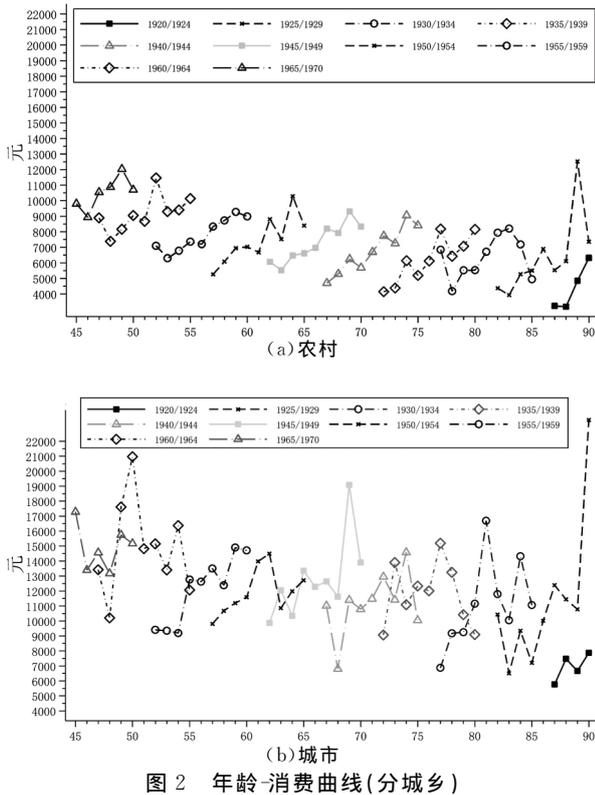


图2 年龄-消费曲线(分城乡)

2. 代际效应。图3和附图2显示总消费和消费分类的代际效应。代际效应的参照组为1920—1924年出生队列。结果显示,总消费随着出生年代推移呈现一定程度上升,1924/1929年队列之后出生的中老年人消费水平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城乡居民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城市代际曲线从1920/1924年快速上升到1930/1934年,此后出生的队列上升趋势较为平缓。而农村从1929年开始到1970年,呈现随出生队列后移而小幅下降的趋势,这导致总样本的消费曲线在1929年之后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消费分类来看,相比1920/1924年组群,食品消费代际曲线持续下降到1940/1944年,此后缓慢上升,衣着消费随出生年代推移缓慢下降。对于中老年群体,医疗保健的代际效应影响更大,代际曲线从1924年持续上升到1949年,此后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之后的年前组群对医疗需求相对更少。居住、家庭用品、交通通讯、教育娱乐和其他消费没有呈现显著的代际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差异。除家庭用品外,城市其他消费分类的代际曲线随出生代际推移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后出生的群体的消费水平早于前出生的群体。

农村居民代际曲线在医疗保健和教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提升更多在于城市中老年家庭,农村中老年人家庭受到影响较少。在城市进程中,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迁居城市生活,留在农村更多是“老弱病残”,这造成了农村中老年人家庭缺乏提升消费品质的经济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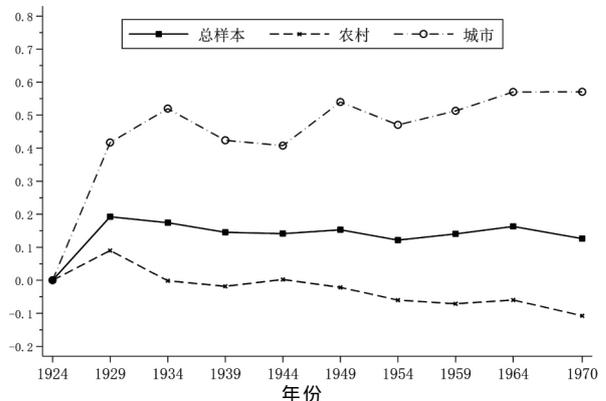


图3 总消费代际曲线

(二) 消费不平等分解

1. 年龄效应。图4显示了消费不平等的年龄曲线(图4和附图3纵坐标为消费对数方差)。结果显示,消费不平等从67岁后开始上升,此前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余玲(2015)发现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从25岁开始持续上升^[11],Ohtake和Saito(1998)发现日本家庭人均消费不平等从22~40岁开始缓慢下降,在40岁以后才开始上升^[9]。本文中老年群体不平等上升年龄点更晚,进入老年后才开始上升,原因在于使用的中老年样本,年龄效应的参照组为45岁。相比45岁,46~60岁之间的生活由于在生命周期积累的财富足以保持基本消费需要,消费不平等程度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但进入老年之后,由于健康风险急剧增加,负面冲击进一步积聚从而推升了消费不平等。城乡之间的年龄曲线有所不同,城市样本消费不平等从79岁点开始上升,农村样本从67岁点开始上升。城市老年人在财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都优于农村老年人,进一步延后了城市老年人消费不平等上升的年龄点。

消费不平等的年龄趋势在不同消费类型中存在差异。附图3显示,食品消费不平等从45~73岁之间呈现下降趋势,衣着和居住的消费不平等随年龄缓慢爬升,但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平等没有随年龄出现显著变化。原因在于,本文的居住消费仅包括水电费、取暖费、燃料费和物业费,在城乡各自内部的差异较小,更多的不同体现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基本没有物业支出。家庭用品消费不平等从55岁开

始上升,原因在于到了老年时期,只有经济情况更好的家庭才会继续聘请保姆。此外,随着年龄增长带来个体健康变化不同,导致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需求存在差异,从而推升了消费不平等。教育娱乐消费不平等趋势从45~53岁之间呈现下降趋势,此后在82岁之前都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子女的教育投资在53岁左右基本完成,从而造成教育娱乐支出水平下降,降低了教育娱乐的消费不平等。城乡消费不平等的年龄曲线随年龄增长也各不相同。相比农村,城市居民在衣着、居住、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上随年龄增长不平等程度上升更快。这可能是城市中老年居民内部由于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差别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在衣着和雇佣保姆上增加支出,造成享受发展型消费不平等程度反而随年龄增长进一步加大。对于医疗保健,城乡居民随着年龄都呈现共同的上升趋势,说明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随着老年化加速,医疗支出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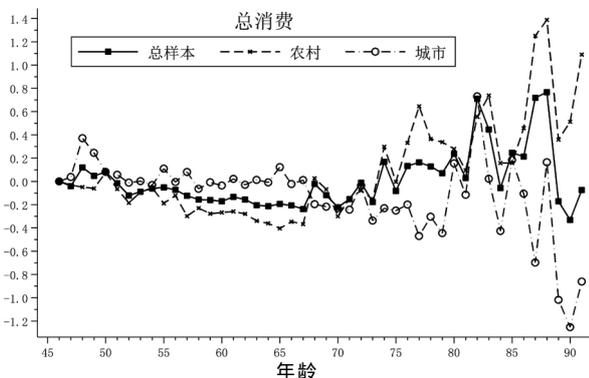


图4 消费不平等的年龄曲线

2. 代际效应。图5和附图4显示了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效应。结果显示,总消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不平等代际效应随着出生年代推移逐渐降低。食品消费不平等趋势和曲兆鹏(2008)^[10]的研究一致。可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出生中老年群体会积累更多财富,在基本衣食需求满足后,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效应更多体现在家庭用品、教育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上。

从城乡内部上看,城市样本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农村样本的代际效应从先升后降,1949年之后出生组群的总消费不平等逐渐下降。从消费分类上看,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不平等的代际趋势和总消费相同,城市和农村的居住不平等都呈现下降趋势。不同于农村,城市居民的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呈现上升趋势,后出生的群体消费不平等程度更高。对于医疗保健,城市和农村都呈现上升的趋势,我们认为因为后出生的群体的健康水

平存在差异,造成医疗支出存在较大差别。我们还发现,农村家庭的教育娱乐不平等从1949年出生之后组群开始上升。我们认为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农村家庭中子女数量比城市家庭更多,同时子女年龄分布跨度更大,部分家庭已经完成了子女的教育投资,造成在教育方面支出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更大,对于文化娱乐的支出能力各不相同,造成支出水平上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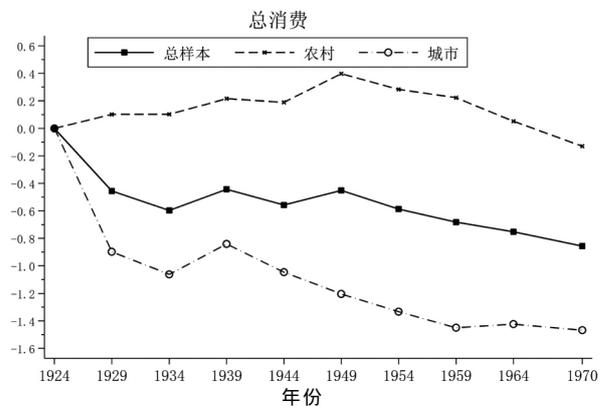


图5 消费不平等的代际曲线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CHARLS数据测度中老年人的消费不平等,根据队列分析框架分解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的影响。中老年家庭总消费从2011—2015年呈现快速上涨,其中上涨幅度最大的是家庭用品消费。但是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总消费对数方差从2011年0.975上升到1.433。结果显示,中老年群体的总消费曲线遵循了生命周期理论,同一队列中年轻的比年老的消费水平更高。从消费分类上看,食品消费水平在不同年龄之间差异最小,医疗保健对中老年人消费水平影响最大。从城乡之间来看,城市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都高于农村,经济增长带来的效果更多惠及到了城市地区家庭,农村中老年家庭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少。

中老年群体内部不平等上升年龄点更晚,67岁以后才开始上升,原因在于健康风险在进入老年后才开始急剧增加,从而推升了消费不平等。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出生中老年群体会积累更多财富,在基本衣食需求满足后,消费不平等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更多体现在家庭用品、教育娱乐和医疗保健。城市老年人在财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都优于农村老年人,进一步延后了城市老年人消费不平等上升的年龄点。对于医疗保健,城乡居民随着年龄都呈现共同的上升趋势,说明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随着老年化加速,医疗支出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

缓解中老年消费不平等,需要坚持乡村振兴战

略,使经济发展更多惠及农村居民,缩小城乡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差距。中年农村居民大部分以外出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低端职业为主,在2015年以后,上述行业的收入增速水平显著下降。面对这一情况,需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居民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加强扶持引导服务,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从而积累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升中老年消费能力,缓解由城乡消费差距带来的不平等。对于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带来的不平等,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依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同时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平衡两者的待遇差距。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医疗支出不平等的加剧,需要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大力推进农村地区精神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完善农村老年群体医疗补助政策,从而降低农村居民因健康风险导致医疗消费不平等。

参考文献:

- [1] Attanasio O P, Pistaferri L. Consumption inequality[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30(2):3-28.
 [2] Blundell R, Preston I.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113(2):

- 603-640.
 [3] Barret G F, Crossley T F, Worswick C. Demographic trends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Australia between 1975 and 1993[J].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0(4):437-456.
 [4] Aguiar M, Bils M. Ha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mirrored incom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105(9):2725-2756.
 [5] Cai H, Chen Y, Zhou L.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92-2003[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0,58(3):385-413.
 [6] 杨继东. 中国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其原因[J]. 财贸经济, 2013(4):111-120.
 [7] 赵达, 谭之博, 张军. 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J]. 财贸经济, 2017(06):115-129.
 [8] Deaton A, Paxson C.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inequa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102(3):437-467.
 [9] Ohtake F, Saito M. Population aging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Japan[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8(3):361-381.
 [10] 曲兆鹏, 赵忠. 老龄化对我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8(12):85-99.
 [11] 余玲铮.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及不平等的动态演进: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6):69-79.
 [12] 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 经济学(季刊), 2013(4):1231-1254.
 [13] 孙豪, 胡志军, 陈建东. 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利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12):41-57.
 [14] Brady D. Reconsidering the divergence between elderly, child, and overall poverty[J]. Research on Aging, 2004,26(5):487-510.
 [15] Deaton A.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78-91.

(责任编辑:钟 瑶)

The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Evidence on CHARLS

SONG Ze¹, HE Yang²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Modern Agricultural Colle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CHARLS to measure and decompos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mong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umption level increased rapidly from 2011 to 2015, but the level of inequality also 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lassification, medical care has the larges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terms of the age effect, inequality rises later in life, starting to rise since age 67.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later born accumulate more wealth. Based on meeting basic needs, inequality are showed on the household faciliti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educatio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medical ca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easurement; decomposition